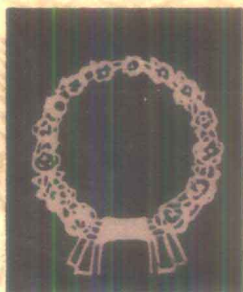


766239



061
54629
F.1

党没有忘记他们 ——红岩英烈(上)

四川人民出版社

061

54629

T.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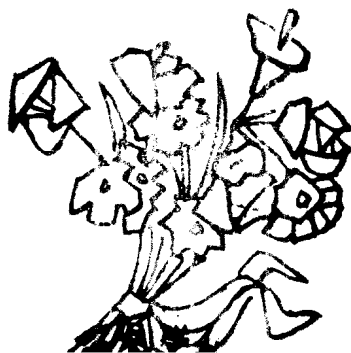
76623J

261
76629

党 没有 忘记 他们

红 岩 英 烈 [上]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红岩英烈编写组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健
封面设计：邱云松
封面题字：秦天林

竟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上)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6 字数 203 千
1984 年 11 月 第一版 1984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5,600 册

书号：3118·265

定价：1.15 元

永遠紀念千百英雄建立新

中國而犧牲的革命烈士！

陳雲公九一。

在故人面前，英勇不屈
壯烈牺牲的烈士們的革
命精神，將永遠受到人民
的敬佩！

永志
84.9.17

紅岩偉業垂青史，
英烈精神勵後人。
萬眾同心建四化，
振興華夏慰忠魂。

陳野軍敬題

冯传庆

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景升

五八三七二

報告 主席哲明

我是四川萬縣人，於1930年，曾在川北保寧做了一個季度的青年團。於1932年春，在成都南溪曉亮同志介紹，參加了共產青年團。1933年春，以我工作的努力，乃正式加入黨的組織。曾在成都北區七委擔任組織幹事，並擔任成都市委宣傳張博（東雲博部所說）等的工作。當時四川領導者，極少劉陳曉生太多，甚至還有黨團內一人領導的錯誤。在1933年12-1月，劉陳生、劉文同志的英勇犧牲，實為子陳文的叛變，四川捕人以致不能在省城立足。乃到川南江安縣並在郝（顏）朱及月餘，孟在郝同志被捕，我乃同黨部他（理）到上川南榮江縣，在教習羅和軍署活動。——934年，劉陳由成都寄方陳春儒的信與領導。935年春，先我到天全縣亮，村主任小亮亮，在陰曆五月廿日，中央紅軍到亮，則村，有中央派張生，劉陳，在紅軍裏面，則七天，七號中央派張生，同陳雲同志由區來，一到上通，我同陳雲同志現險的走了十幾天，到重慶，其時陳雲同志大轉我到上海去，後來他以為劉陳，叫我應四川，陳他的信，再到上海，同時還到同我黨部他理一結為上海，以便工

这是席懋昭（又名席哲明）烈士一九三七年在延安马克思主义学校十三班学习时，向党组织写的自传性报告



陈本立



胡其恩



聂晶



薛传道



黎洁霜



杨光



张露萍



冯传庆



席懋昭



张光伟



张兆琦



胡芳玉



胡有猷



唐文渊



盛腾芳



潘 苍



李泰生



孙一心

认识张露萍时正是抗战的第三天—1938.2.6号

因她是北大的学生名余颖卿

父亲叫张光生母亲名余为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在不和睦中结合的。因此她从小就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母亲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她一生中最不幸的事是四川的家乡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她那时是一个孤儿。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死了。结果在抗战初期。她离开家乡去了香港。她的父亲在抗战初期。给过她一笔钱让她去上学。现在已是一个名震一时的诗人。

她是在抗战初期。离开家乡去香港的。她是一个孤儿。她的父亲在抗战初期。给过她一笔钱让她去上学。现在已是一个名震一时的诗人。她是在抗战初期。离开家乡去香港的。她是一个孤儿。她的父亲在抗战初期。给过她一笔钱让她去上学。现在已是一个名震一时的诗人。

这是张露萍（又名黎琳、余颖卿、余慧琳）烈士一九三九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写的自传

张露萍的自传
在延安抗大学习时
写的自传
张露萍的自传
在延安抗大学习时
写的自传

张露萍自题小像诗一首

前 言

(一)

在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监狱被难未定的六十位先烈,埋名三十多年之后,经过调查核实,从一九八三年起先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四川日报》、《成都晚报》、《重庆日报》等以及中央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对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相继作了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烈士的功勋。广大党员和群众都怀念和学习他们,一致赞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英明伟大。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关怀对被难人员的调查工作。

叶剑英同志听了关于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等七位烈士的革命事迹的汇报后,不仅口述了回忆烈士事迹的片断,还亲笔签署了十分珍贵的证实材料。

陈云同志缅怀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天全县时,受党

中央的派遣，在艰险的环境中机智勇敢地护送他安全出川到上海工作的席懋昭同志，为调查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证实了席懋昭同志对党的重大功绩。

中央组织部不但发出了复查这批被难人员的通知，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而且对调查工作给予多方面的协助。

曾和烈士们共同奋斗过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烈士战友，幸存的狱中难友、烈士遗属和知情的群众，怀着对革命先烈的阶级友爱、深厚感情，提供了大量的回忆和证明材料。

调查工作得到了这样热情的关怀、支持和帮助，烈士们的本来面目才能得以恢复。

烈士的战友、难友、烈士遗属以及广大干部，殷切希望宣传先烈们的英雄事迹；报刊的广大读者、电视观众、文艺工作者，纷纷来电、来信、来访，一再要求我们尽可能详细完整地介绍烈士们的生平和革命斗争事迹，以便从中受到革命的传统教育。

这一切，促使我们在完成追认烈士的工作之后，对每个烈士的生平，革命活动的细节和壮烈殉难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撰写成《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这本书，出版发行。

(二)

红岩英烈，这是具有史诗般时代特点的英雄称号。

红岩又名红岩嘴、红岩村，地址在重庆市区，抗日战争时

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住地。郭沫若同志在题《红岩村革命博物馆》诗中称颂“红岩名太好，今日满堂红。伟业凭开创，解放建丰功。”说明红岩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参加南方局领导工作的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政策，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山城，领导着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党的工作，组织和发动共产党员、革命人士、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培育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在广大城乡播下了革命火种。大部分红岩英烈是在南方局领导下参加革命、成长起来的英勇战士。

一九四二年和四三年，正当抗日战争处在艰苦年代，蒋介石为了强化其镇压共产党、镇压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授权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与美国特务头子联合成立“中美合作所”，设立集中营和建立起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队伍。“中美合作所”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和磁器口之间，占地五千多亩，群山环绕，荒僻险峻，区内电网密布，岗哨林立，有大小二十余所阴森恐怖的监狱，其中白公馆和渣滓洞是罪恶昭著的两口最大的“活棺材”。它是残害革命志士的人间魔窟。一九四六年，“中美合作所”从形式上宣告结束，而实际上是移交给国民党军统局。蒋介石依靠这批由美国装备、训练起来的特务骨干，在各地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仅白公馆、渣滓洞两大监狱就关押了三百多名。被美蒋特务非法逮

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送到“中美合作所”监狱后，受尽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最后遭到枪杀、活埋。一九四六年十月，著名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烈士被杀害后焚尸灭迹。一九四九年九月，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和他的秘书宋绮云两家六口在白公馆遇难。十月，共产党员陈然、王璞等十人被公开枪杀。十一月十四日，共产党员江竹筠等三十人被绑至电台岚垭杀害。（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后崩溃的时候，在蒋介石密令下，对最后一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的难友，进行了震惊中外的疯狂大屠杀，甚至不满周岁的婴儿也惨遭杀害。英雄们在敌人的密集的枪声中高呼革命口号，倒在血泊之中。

（三）

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了，人民欢天喜地走向街头，迎接解放，同时，满腔愤怒地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披着战地硝烟的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率领被难者的亲友、原地下党员和人民群众，奔赴弹痕累累，尸横遍野，焦烟未尽的白公馆、渣滓洞，收殓了目不忍睹、残缺不全的被屠杀者的遗骸，经过辨认和脱险难友提供的被难人员名单，一一进行了造册登记，随后成立了革命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被难人员进行调查核实，确定了第一批烈士名单。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重庆市各界隆重地举行了杨虎

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赶来祭奠英灵。追悼大会由副政委张际春同志主祭，并宣布经烈士资格委员会审定的二百三十六名革命烈士名单。尚有一百多名被难者，有的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基本情况和革命事迹；有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销毁了罪证，加之时间紧迫，一时难以准确地评定他们的政治身份，而保留待查。同年六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继续调查搜集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集中营及其他地方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被难者的材料。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各地党委和人民政府经过调查核实，陆续追认了十一名在“中美合作所”的殉难者为革命烈士。

在十年浩劫中，这个工作被迫停止下来，加之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川东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队的诬蔑，使殉难在“中美合作所”的英灵受到无情的践踏，英名长埋地下，无缘享受人民的祭奠。

（四）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吹绿了祖国大地，党中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评议革命者功过是非的精神深入人心，被难者生前的战友、领导者、亲属、狱中难友，饱含着对被难者的无限怀念之情，纷纷向党组织写信，急切地期待着弄清那些在“中美合作所”被难尚未定为革命烈士人员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出抓紧查清这批被难者的通知。通知着重指出：“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死难者及其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负责。”

中共四川省委、省委组织部对此非常重视，立刻派人到重庆市委组织部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以及有关单位，查找历史资料。从展览馆保存的一九五〇年卷宗的被难人员名单上看，未定为革命烈士的实有九十六人。在这九十六人的登记表上，有姓名、籍贯和简要情况记载的四十四人；其余五十二人，有的有姓名，无籍贯；有的虽有籍贯，但只有某省，无县市地址，而且没有任何情况记载。即使有简要情况记载的人员，他们的分布也极广，除国内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外，还有出生在海外的。由于他们长期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应付敌人，往往改姓换名，同一个人就有几个姓名；被捕后同狱的难友多数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了，而且事隔三、五十年之久，知情者多已不在人世，给调查核实增加了困难。为了查清被难人员的情况，一九八二年三月，省委组织部在有关会议上部署了这一工作，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人事部门为有姓名无籍贯的被难人员提供调查线索，同时经省委批准，从八个地市委抽调了十二位有经验的同志组成复查工作组。

复查组的同志满怀革命热情，决心完成此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他们从重庆市委组织部、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单位保存的历史资料中，从零星